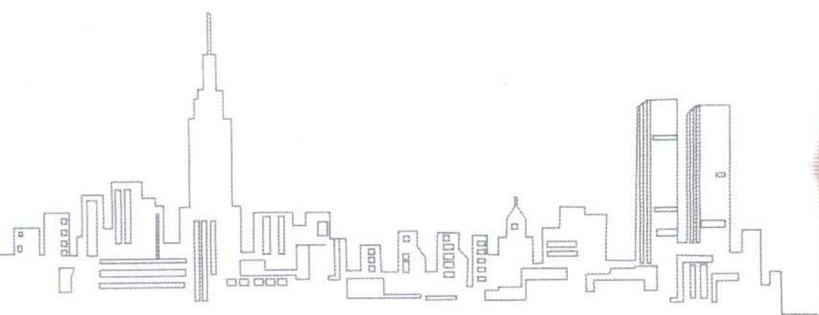




■ 东吴城市哲学译丛 ■

[英]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著 / 董慧 译

资本的城市化：

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 东吴城市哲学译丛 ■

[英]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著 / 董慧 译

资本的城市化：

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

[英]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著；董慧译．—苏

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5

(东吴城市哲学译丛)

ISBN 978-7-5672-1833-8

I. ①资… II. ①大… ②董… III. ①资本主义—城

市化—研究 IV. ①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2318 号

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113 号

Copyright©1985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 | | |
|------|--------------------------------------|
| 书 名 | 资本的城市化：
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
| 著 者 | [英]大卫·哈维 |
| 译 者 | 董 慧 |
| 责任编辑 | 汤定军 |
| 装帧设计 | 吴 钰 |
| 出版发行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
| 印 刷 | 宜兴市盛世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 mm×1 000 mm 1/16 |
| 字 数 | 294 千 |
| 印 张 | 16.25 |
|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672-1833-8 |
| 定 价 | 37.00 元 |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序 言

自从我写了《社会正义与城市》以来,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关历史和城市理论进行更明确的解释,一直是我的学术抱负。《资本的城市化》和《意识与城市经验》这两本书中所收录的研究就是沿着那条道路前进的标记。

我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转向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并在其中重申了我的信念,把它们作为唯一适用于积极性构建的范畴。这种积极性建构是严密、全面且科学地理解一些与资本主义城市进程的历史地理学一样复杂和丰富的事情。这个科学的建构方式也具有政治意义。严密的科学在处理人类事件中永远无法中立;在最严密的生产和善意的伪科学中试图将自身置于历史之外的这些努力中,实证主义无疑是最好的例子。但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即意识斗争,或称之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得不建立在资本主义如何运作以及它的运作如何自然地产生某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意识的彻底唯物主义理解之上。为了改变这个世界,他似乎在说,我们必须理解它。但是这个过程不能被片面地理解。马克思问道:谁来教育这些教育者?对世界的革命性理解不能从被动的沉思中获得,而只能通过积极的斗争提出来。只有通过改变世界我们才能改变自己。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变世界。但是这个口号也不能被片面解读。对我们认识的积极反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对马克思的概念平民化和霸权化的斗争、对我们

自身斗争的历史经验之评价与积极克服障碍的斗争一样是同等重要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撰写了《资本论》，为什么我能够写出这些文字。

然而，以马克思的术语来寻求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理解，就是诉之于一个有争议、不完整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有问题的框架。我试图就《资本的局限》中的不完全性写点什么。我尝试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各种“空盒子”，如：固定资本循环和人造环境的形成，租金拨款，货币、金融和信贷的运转，货币和金融危机的生产。如果我想要建构一个全面的城市理论的话，我需要将这些现象理论化。但奇怪的是，大多数评论者（我怀疑，主要是出于学科偏见）却忽略了我认为在这份工作上最非凡的贡献——空间生产和空间配置的整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精髓中的积极因素。这种关键的理论创新可以使我的思考由历史维度向历史地理维度转换，它开启了一条全新之路，即将城市进程看作一个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学中的积极过程。

当然，我欣然承认，自己对人类事物空间维度的很多痴迷来自于我的地理学科背景。但是，正如 Giddens (1981) 所坚持的那样，如果时间-空间关系是“社会系统的构成性因素”，那么空间问题当然太重要了，得由地理学家来专门研究。因此，形形色色的社会理论派别都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然而，一直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并且是几乎压倒一切的倾向，即优先考虑时间和历史而忽视空间和地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马歇尔均如此认为。正如 Giddens 继续观察的那样，我们缺乏一种“能够使空间（包括对空间的控制）与社会理论整合起来”的概念容器。这种缺乏有双重困扰。首先，将有关空间和空间关系、地方、场所和环境的观念插入任何不同的、所谓强大但不占空间的社会和理论构想中。参与自由竞争的微观经济学家发现只有空间垄断和价格未能产生平衡；宏观经济学家发现了与中央银行一样多的经济体以及影响他们之间关系的大量推测；社会学家认为各种各样的“空间-时间边缘”打乱了其他的结构连贯进程；马克思主义者采用了一个适用于普遍阶层联系的词汇，发现了邻居、社区和民族，他们将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分化成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奇特地形。每当社会理论学家积极寻求地理和空间范畴意义的时候，他们要么被迫去做很多临时的调整，

以至于使其理论变得支离破碎,要么被迫去重新阐释最基本的命题。因此,Saunders(1981,278)在最近一次挽救所谓城市社会学分支学科丑陋命运的努力中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命题,对于它们而言没有辩护是能或者曾经能够被发现的,“空间问题必须与对具体社会进程的关注分开”。

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优势。有调查表明,那些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对空间概念和地理学维度的严肃讨论都是徒劳的。马克思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他无疑赋予时间比空间多的优先权,并且并不反对摒弃作为一个不必要的复合体的地理变异问题。当然,正如我在第二章详细阐述的那样,他有时承认空间和地方的重要性,但这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弥补过分重视时间而忽略空间这一理论的不足。历史唯物主义似乎默认历史转型研究,然而却忽视了资本主义如何生产它自身的地理学。这留给列宁和帝国主义理论家一个需要填补的巨大空缺。不幸的是,他们通过临时调整,在俄国和印度(好像这些地方具有内在意义)允许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讨论,而且激发起一个剥削的替代性修辞,这种剥削是中心剥夺边缘、第一世界征服第三世界、资本权力集团竞争以获取空间统治(市场、劳动力供给、原材料、生产能力)。但是我们怎样能使得这一观点,即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人们的剥削和斗争,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动力是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赋予的观点一致起来呢?列宁、卢森堡和其他帝国主义理论家所提供的上述对空间问题的临时专案,只不过为关于“民族以及民族自我决定权、城乡矛盾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前景、对于城市社会行动的适当回应、地理去中心化的重要性”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含糊的、引发野蛮行为和通常破坏性的争论奠定了理论基础。遗憾的是,临时的调整在论及空间中的资本主义时,并没有考虑空间如何被生产以及空间生产如何整合到资本主义动力及其矛盾之中。我坚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应该成为我们理论化的目标。

这直接提出了历史地理(事实上经历的)和理论之间适当关系的问题。就这一点,有许多关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缺陷的批判性争论,主要集中在理论外围及连贯框架内部的证据,这个连贯框架是来阻止“独立”确证的。

对于那种批判已经有不同层级的反应。首先,那些认为任何一种语言捕获经验并且在表现外在世界结构的过程中没有问题的人,都是在进行浮夸和伪善的劝诫。独立于理论的信息总是相对的。因此,选择存在于通向一个普遍问题的不同途径模式中。其次,对偏爱这种途径而非另一种途径是有充足理由的。比如说,实证主义的抽象理论首先必须被翻译成工作模型(一个活动,它必然在同一框架中围绕一个理论和数据的表征来进行),然后检验那些本应是重复和独立事件样本的数据。就调查领域而言,这样的程序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它与历史地理非常不相关,而历史地理是空间和时间中高度相互依赖的事件中独特的配置。衡量城市的增长没有任何意义,就如同其中没有贸易、资本流通、移民或者它们之间的文化和政治影响一样。正因为如此,很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倾向于在共同语言的含糊之处隐藏他们的理论和政治方向。与那些具有诱惑力的杂音相比而言,实证主义表现出具有感染力的严谨性。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公开地、有意识地关注与历史地理进程的独特配置相关的、严格的理论构建。然而,理论构建不会抽象地产生,而是在经验、行动、概念形成和辩证法的理论化之中蕴含着一个连续的对话。因为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圈子中有大量的讨论,并且通常是热烈的——包括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和像 E. P. 汤普森这样的历史学家之间的著名的两极观点——我应该可以公开地阐释我自己的路径。

理论建构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这种逻辑需要以自己的术语来理解。这种为人所知的概念容器之中的张力,正如马克思所遗赠给我们的,能够用来引出新的论证,来表现“映射”(用马克思的术语)一个特定生产模式的历史和地理的动力。我们辩证地(而非内在演绎地)从一些看起来似乎安全的概念岛屿着手来探测未知的海洋。不同的起点会对我们寻求理解的现实产生不同的视角。从某个角度看是一个安全的概念容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是部分的和片面的。但不同理论视野的建构能够帮助我们以更好的准确性来描绘生产模式的复杂性。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有关生产的立场与第二卷中有关流通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是非常不同的。将两个视角结合起来(马克思从未完成的事业)应该能够给我们一个关于生

产模式和它内在矛盾结构更完整的画面。那么,就有可能在上述矛盾之上建立一个理解:在金融资本、国家机器以及不平衡地理学(引用《资本的局限》中提出的某些主题)领域把握连续的解决方案和那些张力的内在化。

那么问题就是将这些理论争论与经验以这样一种方式联系起来,即在提出先进的理论命题的准确性上建立或大或小自信。然而,我们对这样一种观点,即有某种被称之为不需要想象的“经验”的东西,从未感到自在过。我们通常凭借熟练的概念工具探寻世界,如我们智力的资本设备,运用那些术语来宽泛地解释这个世界。但幸运的是,存在这些时刻、事件、人们和经验,它们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冲击想象力,动摇和冲击已被接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需要另外的、想象的或理论的飞跃来赋予它们意义。此外,经验以很多形式出现。街头的互动和观察、对在街角塞进每个人手里的地方报刊和所有小册子的阅读、当地对国家和国际政治合作的政治行动和努力全都在冲突的经验混乱之中。那么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学——广阔、散漫、多样有时是纯粹浮夸和容易挑起论战的(并且不是那么有趣),在其他时候则诉求于枯燥无味的科学。分析者不得不对所有的这些进行探究,对之前提出的思想和信息进行斟酌,有时候与那些超过他们的学者进行激烈的学术斗争。文学也不是纯粹的学术。小说、表演、诗歌、歌曲、绘画、涂鸦、摄影、建筑绘画和设计……所有这些提供了一些线索,包含了潜在的惊喜。我承认我对于城市过程的思考一直受城市历史学家的影响,同样也深受吉登斯、左拉、巴尔扎克、吉辛、品钦和许多其他人的影响。

但我发现自己深深地被这些作品所吸引,我认为恩格斯1844年创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最精彩的,它既是文学和社会理论,同样也是历史和当代评论。我想,正是出于对它的钦佩,我才被首先吸引到对巴尔的摩住房市场(见第三章)的详细研究中,然后是对1848年巴黎转型和1871年产生的巴黎公社的研究(在《意识与城市经验》第三章、第四章中详细报道了)。这些为我们挖掘新的洞见来挑战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矿藏。然而这些研究取决于对某些历史的重建有可能维系的理论和概念框架的先前经验所做出的结论。恩格斯为巴尔的摩的住房研究提供了框架,《资本的局限》则为我调查奥斯曼时代巴黎的转型提供了基础。

经验的历史、地理的基础和严格的理论建构之间的道路很难调和。如果我否认其存在着循环和同义反复的构成性危险的话,我将是愚蠢的。诚然,我可能会像其他人(从实证主义者到人文主义者)一样,仅仅看到我所想看到的,并且仅依靠理论给定的术语来重建经验。但是那种危险存在于研究的所有领域,绝不是限于马克思主义。那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应该怎样面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做的:极为重视反思和推测的个体和集体过程,将其作为理论和经验之间的调节步骤。

这里的推测是指通过经验的介入、概念筛选的调整以及为了创造新视域和维度来解释经验的戏法对概念工具的拷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范例。通过反思,我内心有了对经验的评价,有了一个能够指出新方向、提出新问题并且为历史的和理论的探求建议新领域的结论。我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看作那种思考类型的一个典范。反思和推测同时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路径,因为它们为理论结论界定了一个开放和流动评价的场域。如果验证在马克思主义词汇中有任何正式意义的话,那么它就存在于与政治行为相关的反思和推测以及开放的、富有成效的品质之中。通过反思和推测获得的永远警觉,是我们所具有的唯一即刻保障。然而,从长远来看,历史地理会用它自己的方式来调和那些缺乏唯物主义相关性的理论视角。

这两部相关作品的研究针对的是,将理论与历史地理学的经验以一种旨在启发各自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势不可挡的关注这一背景。不幸的是,与大量材料一起的主题性考虑规定着一种分化,这种分化折射出而不是克服历史地理与理论之间的分化。《资本的城市化》在理论化的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偏见(尽管不全是这样),而《意识与城市经验》则更多的是推测性的、历史的。尽管每本书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但我至少还是想表达一种希望,即它们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

主题的分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对资本城市化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劳动力,如何利用空间配置的特殊形式创造一个人造环境的“第二自然”。我主要关心的是:资本主义通过其形象怎样创造了一个包括道路、房屋、工厂、学校、商店等物理景观,以及在那样空间生产的过程

中出现的矛盾是什么。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循环研究能够被拓展,也能够被分解来笼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循环,以及金融资本的干预和租金攫取者的问题。就程度来说,这对于理论化来说是一个更为容易达到的目标。但是这些资本的城市化过程是与社会关系城市化并行的,它通过工作地方与居住地方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重组与控制、迎合资本主义需要的消费进程之重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关的社会空间之碎片等来实现。在资本投资的生产力和被要求重新生产出日益城市化的资本主义之间相互作用这一视域中,资本的城市化是对象化的。但是这意味着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些过程中的政治意识寓意。因此,我提出,“意识的城市化”本身就应该被看作一个真实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但是这个观点更难从理论上去论述(ground),至少考虑到提供给我们的理论工具(尽管像葛兰西和卢卡奇这样的思想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因此,对意识和城市经验的研究更加不确定,越来越多地依赖对历史-地理经验细节的考察。

但是为什么选择“城市”作为分析的框架呢?因为,它毕竟是空间生产与政治意识有可能被探查到的几个空间规模——邻里、地区、民族国家和作为他者的权力集团之一。实际上,有很多社会理论家,包括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把城市化的思想作为一个“从理论上说具体的分析对象”。据说,对城市进程的考察充其量能够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产生“真实的但相对而言不太重要的见解”(Saunders, 1981)。甚至像 Giddens (1981, 147) 那样多少认真看待空间问题的人,他们更多倾向于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城市不再是主导时间-空间的容器或者‘权利的熔炉’;这个角色由以地域为界的民族国家来设定”。只有偶尔像 Jane Jacobs (1984) 这样的特立独行者,首先坚持优先将城市看作是分析的一个单元。

通过聚焦于城市化,我并不是想把城市化看作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相分离的、理论化的具体分析对象。马克思强调,资本必须被设想为一个过程而不是被具体化为一个物。城市化的研究是对通过自然和社会景观的生产以及意识的生产而呈现出来的、过程的研究。城市化的研究不是对一个合法的、政治实体的研究,也不是对加工物的研究。它关涉以下几个方面:资本流通过程;劳动力、商品和货币资本流的转换;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

关系的转换；信息运动和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等。法律意义上的城市已丧失政治权利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差异性的城市经济正并入大城市群中心的事实只不过是这一城市进程的一部分。如果这听起来含糊其词，并且与通常具体化的城市研究相比有些分歧的话，那也是特意安排的结果。我更喜欢对分歧保持开放的态度，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集中精力将城市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专注于安全的具体化，即隐藏而不是揭示出正在起作用的流动过程。用那种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将城市过程的理解整合成为更宽泛的资本主义动力学概念，并且理解每个部分如何成为另一部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引用了很多文献，这些都很难列举出来。我得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与环境工程系这个机构的支持，我想感谢沃尔曼教授所提供的一切。与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的卡罗尔·埃利希一起工作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的艾莉森·理查兹在出版阶段做了出色的工作。巴尔的摩的很多好朋友帮助我观察、理解，并且参与一些或许会从我身边溜走的事情。可能选择不太公平，但允许我对芭巴拉·科佩尔、里克普费弗、文森特·纳瓦罗、克里福·杜然得、切斯特·维克怀尔表达个人的感谢。在那些与霍普金斯相关的人中，我想要提到拉塔·查特吉、吉恩·玛米、约翰·巴布科克、艾米卡普兰、艾丽卡舍恩伯格，并且我要特别感谢迪克沃克、尼尔·史密斯、贝亚特里斯·诺菲。我欠他们太多。

目 录

Contents

图目 / ii

表目 / iii

序 言 / iv

第一章 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分析框架 /1

第二章 资本积累的地理学:马克思理论的重建 /30

第三章 垄断阶级地租、金融资本与城市革命 /61

第四章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租 /88

第五章 阶级结构与居住分异理论 /107

第六章 城市政治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地理学中的地位 /123

第七章 关于规划意识形态的规划 /163

第八章 资本的城市化 /183

References /225

Index /234

图 目

- 图 1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的关系(来源:《资本论》第 1 卷) /4
- 图 2 马克思的“扩大规模上积累模式”中的关系(来源:《资本论》第 2 卷) /5
- 图 3 资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循环中的关系结构 /9
- 图 4 英国某些选定的人造环境中的投货,1835—1914(百万英镑按当期价格) /16
- 图 5 巴黎的建设活动——城市的建筑材料条目,1800—1910(数百万立方米)(参照:Rougerie,1968) /17
- 图 6 美国建设同期,1810—1950,顶部:美国人均来建筑活动(1913,人均美元)(参照:B. Thomas,1972) 底部:美国公共用地的出售(数百万/英亩原始土地条目)(美国农业部数据) /17
- 图 7 与(美国)GNP 和(英国)GDP 有关的人造环境投资的不同周期 1860—1970(5 年移动平均值) /18
- 图 8 大西洋经济的不平衡发展,1865—1914——英国和美国。(B. Thomas 之后,1972) /18
- 图 9 英国和美国房地产繁荣的某些指标,1995—1975 /19
- 图 10 巴尔的摩市由 FHA 担保的抵押贷款的分布,1970(来源:Lusk 报告) /72
- 图 11 美国 1960 年个人通勤领域的极限 /127

表 目

- 表 1 巴尔的摩住房次级市场,1970(机构行为) /74
- 表 2 巴尔的摩住房次级市场,1970(人口普查数据) /75

第一章 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 分析框架

我的目标是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进程。我将只谈论城市化的资本主义形式,因为我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的“城市”有其特定的含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若不发生根本变革的话,这一特定含义是不能够被应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

在资本主义框架中,我坚持从积累和阶级斗争两个孪生主题来解读城市发展进程。这两个主题是内在统一的,它们应该被看作是同一硬币的两面,是我们观察资本主义活动总体性的两个不同视角。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特征意味着资本支配劳动力。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掌控着生产过程,并且为了创造利润来组织这一生产过程。而劳动者只能支配他或她的劳动力——一种必须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的劳动力。劳动者必须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剩余价值)以换取生活工资,因而就出现了统治。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极其简单,而实际的生产系统中(包括生产、服务、必要的流通费用、分配、交换等)真实的阶级关系(以及阶级派系之间的关系)却是高度复杂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洞察力在于,看到了资本支配劳动所产生的利润,还看到了资产阶级若要存活并且繁衍自身的话,必须不断扩大利润的基础。因此,我们得出一个有关社会的观念,这个社会则是建立在“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原则之上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

立起来的资本积累理论实际上是要对积累的动力学进行详细的考察,对积累动力学的矛盾性特征进行探究。上述论断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或许听上去更像经济学家的观点,但我们必须记得,积累是资产阶级进行自身和支配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因此,资本积累是不能从阶级斗争中孤立出来理解的。

一、资本主义的矛盾

我们可以认为,有关城市进程的所有讨论都是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的分析。下面让我列举出这些矛盾的主要形式。

首先,我们考虑一下资产阶级自身内部的矛盾。在交换领域,每个资本家都在个性的、自由的、平等的世界里发挥影响,他们可以而且必须自发地和创造性地行动。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经由竞争被确定为“控制每一个个体资本家的外在的强制性法律”。表面上的个性化和自由隐蔽了遵从和压制的暗流。但是,个体行动向符合阶级规范的行为的转变既不全面也不完美——它永远也无法做到这样,因为在资本主义规律之下,交换过程往往假定了个性的存在,而这个时候价值规律通常在社会关系中维护着自己的权利。因此,每个追求自己直接利益的个别资本家是可以完全对抗集体阶级利益的。举一个绝好的例子来说明,那就是竞争有可能会强迫每一个资本家去延长工作时间,增大工作强度,从而导致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的能力严重受损。个人创业活动所产生的集体效应能够对未来资本积累的社会基础产生严重的威胁。

其次,我们考虑一下积累对于劳动者的潜在含义。剩余价值理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利润在于对劳动力的剥削。因此,资本主义形式的积累取决于资产阶级施加于劳动者的特定的暴力。然而,马克思指出,这种掠夺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即掠夺不会侵犯那些像在交换领域一样盛行的平等、个性和自由的法则。与资本家一样,劳动者在市场上“自由地”进行贸易销售。但是,劳动者同样也存在着就业的相互竞争,与此同时,他们的工作进程则在资本家的控制之下。因为竞争激烈,资本家们无可奈何地被

迫向他们雇佣的劳动力施加越来越多的暴力。个体劳动者对于这种猛烈的暴行是无力反抗的。对于劳动者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自身组织成为一个阶级,并且找到集体地反抗资本掠夺的方式。结果就是,资本积累模式使得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公开的、明确的阶级斗争成为可能。阶级之间的矛盾解释了资本主义历史动力学的许多内容,并且这种解释在很多方面对于我们理解资本积累进程尤为根本。

上述两种矛盾形式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们表达了一个根本的统一性,应该被视为同一现实的不同方面。然而我们能够在某些方面有效地将它们分开。不论资产阶级的内在矛盾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对抗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有多么紧密,这两者却是完全不同的。接下来,我将在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必然强加于其上的暴力缺乏公开回应的情况下,集中讨论积累过程。然后,我会拓展视角,思考工人阶级如何组织起来,以及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如何上升为影响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进程的公开的阶级行动这样一个问题。

各种各样的其他矛盾形式也可以补充到资本主义矛盾形式的相关分析之中。例如,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往往存在于一种与非资本主义行业或前资本主义行业相敌对的关系之中,而这些行业有可能存在于这种对抗关系之中(国内经济、农民、手工业生产行业等),或者在没有这种对抗关系的情况下也存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等)。我们同样还应该注意到与一种“自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于积累动力学与一种以资本主义方式来界定的“自然的”的资源基础之间的关系之中。这些问题显然需要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城市化进行历史的分析过程中进行考虑。

二、积累的规律

我从勾勒生产系统和价值实现中的资本流结构开始分析。这一分析借助于一系列图表来完成,这些图表看起来具有高度的“功能主义”的特征,它们可能在结构上过于简单,但却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积累过程的基本